

三俠五義



三 侠 五 义

石玉崑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三 俠 五 義

石 玉 崑 著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6印张 2插页 600,000字

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11·1282 定价 2.30元

石玉崑与《三侠五义》(代序)

黄天骥

(一)

《三侠五义》(又名《忠烈侠义传》)是一部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小说。它的出现,引起社会上广泛的注意。

本书作者石玉崑,字振之,天津人,大致生于清代嘉庆十五年,死于同治十年,活动于1810年至1871年间。

石玉崑是晚清著名的说唱艺人,人称“石先生”,“以巧腔著”。登场时,抚弦弹唱,字句清新,自成一派,被誉为“石派书”。金梯云抄本《子弟书》中,有《叹石玉崑》一节,描写石玉崑说书的情景:“则见他拨动了三弦如施号令,满堂中万缘俱静鸦雀无声;但显他指法儿玲珑嗓音儿嘹亮,形容儿潇洒字句儿清新。众诸公一句一夸一字一赞,合心同悦众口同音。”

据传,石玉崑当过礼王府的“供奉”^①,随时随地都要应台献艺。不过,也有人说他颇有骨气。富察贵庆在《叹石玉崑》一诗中说他“为底朱门无履迹,曳裙应怪太纷纷。”诗前又有小序

^① 见金受中《志书馆见闻琐记》。

说他“性孤僻，游市肆间，王公招之不至”。由此看来，他虽然身为供奉，不得不周旋于权贵之间，但仍然和权贵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

石玉崑演唱的拿手好戏，就是《三侠五义》。这部书，原是他的唱本，又称《龙图公案》。《叹石玉崑》一诗称道是：“高抬身价本超群，压倒江湖无业民。惊动公卿夸绝调，流传市井效眉��。编来宋代包公案，成就当时石玉崑。”这说明石玉崑根据包公故事编的唱本，是他的成名之作。既“惊动公卿”，又“流传市井”，能适应不同阶级的人的口味，表明它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，既有一定的人民性，也有适合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地方。

《龙图公案》成书时，大概石玉崑已经去世。后来有人删去了唱本的唱词，在文字上稍加整饬，就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小说《三侠五义》。

(二)

石玉崑活动在我国封建社会面临崩溃的时刻。

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，我国逐步变成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。从明代中叶开始，我国封建社会内部便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，外国资本的侵入，进一步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。在石玉崑生活的年代，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，生活日益贫困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，终于导致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，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。马克思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曾经指出：“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刻，统治阶级内部的、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，就达到非常强烈，非常尖锐的程度。”小说《三侠五义》，正是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

尖锐而又复杂的斗争。

全书一百二十回，可分为两大部分。前一部分主要写侠客协助包拯与奸臣庞太师父子进行斗争；后一部分主要写侠客协助颜查散剪除奸王襄阳王的羽翼。环绕着这两大情节，书中穿插着若干个清官侠客打击奸佞，除暴安良的小故事。而所谓清官和侠客，从本质上来说，是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，其中许多人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。因此，忠奸的斗争，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。《三侠五义》揭示了这一冲突的过程，这对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症候，是有一定帮助的。

《三侠五义》的第一个情节“狸猫换太子”，开宗明义地向读者展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惨酷。在宫廷里，刘妃为了夺宠，阴险地把李妃生下的婴孩换成狸猫，害得李妃被打入冷宫，连无辜的宫女和太监也为此丧生。这宫闱里面鲜血淋漓的悲剧，表明了临近覆灭前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，强烈到何等程度。

紧接着这一情节之后，小说又写了包公的降生以及他在幼年的灾难。包公的二兄包海觉得，多添了一个兄弟，就使自己承袭的遗产少了一份，“好好儿的‘二一添作五’的家当，如今弄成‘三一三十一’了”。于是便千方百计要把包公置于死地。这个情节，在客观上显示了作为封建社会细胞的家庭，其内部财产权力之争，是怎样的尖锐和激烈。

面临灭顶之灾的地主阶级，从最神圣的宫廷到普通的家庭，都把权力看作是救命稻草，彼此拼死争夺。为了苟延残喘，也为了满足垂死前不可遏止的贪欲，他们在内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搏斗。《三侠五义》在全书开头，写下了颇有象征意味的情节，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血淋淋的现实，揭开了封建阶级

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，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命运。

《三侠五义》中的清官和侠客，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里展开活动的。

(三)

在石玉崑看来，封建王朝，危机四伏，主要是朝野上下出现了一批依仗特权，欺压人民的皇亲国戚和土豪劣绅。他以酣畅的笔触，揭露奸贼们无法无天，蹂躏百姓的罪行。如庞昱，葛登云，马刚，马强，苗秀，苗恒等，不是皇亲国戚，便是一方恶霸。他们仗着有钱有势，横行乡曲，鱼肉百姓。作者怀着愤懑的心情，给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以猛烈的鞭挞。当然，和《水浒》《红楼梦》等最优秀的作品相比，《三侠五义》对现实的揭露，要逊色得多；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，反映了社会的真实。

要挽救这个危局，解救人民的痛苦，作者便把希望寄托在公正廉明的清官身上，于是书中便出现了包拯、颜查散等清官形象。

在我国文坛上，很早就有以官吏审案为题材的戏曲和小说。吴自牧《梦粱录》提到宋代说书人有烟粉灵怪，传奇公案，朴刀杆棒等名目，所谓公案，说的就是官吏审案的事，其中象《错斩崔宁》、《合同文字记》便是当时很有影响的话本。在元代，舞台上的公案戏大量出现，写包公断案为民除害的戏尤其流行，象《包待制陈州粳米》、《包待制智勘生金阁》《丁丁当当盆儿鬼》、《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》等等。自宋代起，便有传奇公案的唱本；到元代，舞台上的公案戏便大量出现，而“包公戏”尤其流行。《三侠五义》写的有关包公的情节，有许多便是在民

间传说和元代杂剧的基础上，加工发展而成的。

在石玉崑笔下，包公是一个大公无私，刚直不阿，机智果断，为国为民的理想人物。书中第三回说到宁老先生给他起名：“遂乃给包公起了官印一个‘拯’字，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；起字‘文正’，取其意‘文’与‘正’，岂不是‘政’字么？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。”这段话，实质上也是作者对包公所作的评价。接着《三侠五义》写包公初出茅庐，便显得才智过人。第一次审判“伽兰殿杀人”案，他便注意调查研究，从现场中发现蛛丝马迹，经过缜密推断，判明案情，捉住真正的杀人凶手。其后，又连续写了包公判明了几个情节复杂的案件，把谋财害命，作奸犯科的凶犯，一一揪出，从而刻画了包公料事如神，明察秋毫的特质。

包公不仅在市井细民面前，秉公执法；在当朝权贵面前，同样铁面无私。太师庞吉之子庞昱，在陈州放赈，荼毒百姓，无恶不作。包公既没有因他是当朝权贵便畏葸不前，也没有因自己与庞吉有“师生之谊”便徇私废公。为了给受害者申冤雪恨，包公设计拿住了庞昱，问明罪状，立即把他斩于龙头铡下。地主恶霸葛登云，仗着自己是侯爷，作恶杀人，“谅包公也无可如何”，犯在包公手里，同样被斩。这些描写，把包公的凛然正气，耿直性格，表现得相当突出。

但是，和民间文学相比较，《三侠五义》里的包公形象，棱角稍稍磨平了些。例如民间戏曲《秦香莲》里的包公，敢于声称“龙子龙孙我也不饶”，为平民百姓申冤除害，把自己的生死置诸度外。而《三侠五义》里的包公，和国戚庞吉斗争时，则往往投鼠忌器，庞吉多次打击陷害，他也只是参奏一本，听皇帝发落了事。当他向皇帝介绍卢方、蒋平等人时，害怕“有犯圣意”，便把“钻天鼠”改为“盘桅鼠”，“翻江鼠”改为“混江鼠”，表

现得相当怯懦。石玉崑对包公形象的这种处理，多少反映了他思想的局限；不过，他毕竟保存了民间传说的基本精神。《三侠五义》里的包公，仍然不失为刻画得比较成功的清官形象。

石玉崑把希望寄托于清官，然而，他毕竟还看到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清官即使执掌着上方宝剑，也未必能依法惩办残民以逞的凶徒。为了保证清官能闯过大大小小的政治险滩，作者设想在清官周围有一群武艺超群的义士侠客。这些义士侠客既保护着清官的安全，又帮助清官完成侦破缉拿等工作，还以本身的侠义行动，锄强扶弱，救民于倒悬之中。作者认为，社会上有清官和侠客两条支柱，才能四海升平，万民乐业，“莺花无限日高眠”。于是，他把“传奇公案”和“朴刀杆棒”结合起来，让清官和侠客结合起来，从而写出了风格独特的《三侠五义》。

(四)
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谈到《三侠五义》时说：“侠义小说之在清，正接宋人话本正脉，国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。”

侠义故事和公案故事一样，在我国也有悠久的传统。《史记》有《游侠列传》《刺客列传》，唐代传奇小说也刻画过昆仑奴、虬髯客等侠士形象。侠士济弱扶危的故事，一直在群众中广泛流传，为群众所喜爱。由于侠客们武艺超群，行踪诡秘，富于传奇色彩；加上他们当中许多人能严于律己，“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”，有些人还和封建统治者对立，“侠以武犯禁”。因此，在封建社会里，他们往往被视为救星。不过，由于侠客们总是单凭个人的力量战胜对手，他们遵循的道德标准，也不可能超越出封建伦理的范畴，因此，他们往往会被封

建统治者所利用。

什么叫做侠？这一点，石玉崑的认识是明确的。他指出：“行侠作义的人，到处随遇而安，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，只因见了不平之事，他便放不下，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，因此，才不愧那个侠字。”（第十三回）他还通过北侠欧阳春之口，说出了侠义的特色：“凡你我侠义作事，不要声张，总要机密，能够隐讳，宁可不露本来面目，只要剪恶除强，扶危济困就是了”。（第六十回）很清楚，作者认为，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，能够机智勇敢地扶危济困的人，才能称之为“侠义”。

《三侠五义》所写的侠客，继承了朱家、郭解的优良传统。如白玉堂、展昭、欧阳春、蒋平，是作者花费笔力最多，写得最为成功的侠客形象。他们的脾气和行径，虽各有不同，但都具有扶危济困，剪恶除强的品质。如白玉堂夜盗苗秀的不义之财，周济嫖寡孤独。欧阳春单人匹马，直闯马强贼窝，解救受害者。蒋平、韩彰见流氓花蝶四出作案，便紧紧咬住不放，冒着风险，围歼凶徒。连小侠艾虎也晓得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挺身帮助绿鸭滩的渔户打退歹徒。显然，侠义们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压迫者和剥削者。他们的行动，总的来说是正义的；不能因为在他们身上有浓厚的封建思想，便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。

侠义们所讲的“义”，当然是属于封建道德范畴的。封建统治者提出：“义者，宜也”，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掩盖这个概念的阶级内容，让它为封建统治服务。但是，封建时代的劳动群众，也往往利用“义”来表述被压迫者相互之间同舟共济、患难与共的美德。《三侠五义》所写的“义”，情况相当复杂，里面既有封建落后的东西，也有健康可取的成份，应当区别对待。但是，有一点是很明白的，他们的“义”，并非无原则的、一般的“江湖义气”。侠义们见义勇为，济弱扶困，固然是正义的行为；就

朋友关系来说，也并非不问是非，一味讲究为朋友效劳。例如展昭被擒后，由于误会白玉堂霸占良家妇女而引起的斗争，以及白玉堂当着柳青的面整治柳青推荐的人，就足以表明他们心目中的“义”，是有原则的，并不因朋友关系而有所迁就。愣爷赵虎虽然是包公的护从，但是当他听到“包三公子”干坏事的时候，便气忿得很，指使苦主到开封府衙门击鼓鸣冤，故意给包公出难题。“看我们相爷怎样办理？是秉公呵，还是徇私呢？”这些，虽然都是出于误会而发生的冲突，但也说明侠义们重视伸张正义，并非是只懂得“江湖义气”的愚昧浅薄的匹夫。

让侠义们的行动充满传奇性，闪烁着浪漫主义的色彩，是《三侠五义》在创作上的一个特色。

在《三侠五义》里，作者写侠义们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，但他们全都艺高人胆大，明知山有虎，故向虎山行，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气概。欧阳春视“招贤馆”内的众多打手如同草芥，在灯影里把对手射来的铁弹反磕回去，打得他们叫苦不迭。那神奇的本领，令人拍案叫绝。第一百零三回，邓车把颜查散的官印丢在逆水泉里，这泉深不可测，“碧澄澄回环来往，浪滚滚上下翻腾，那一股冷飕飕寒气侵入肌骨”。别人看了都打着寒战，而瘦小的蒋平却敢于钻进水中，把金印掏了出来，他那知难勇进的豪气，使人心往神驰。钻天鼠卢方奉命爬上高耸入云的旗杆，作出种种姿态，“猛然间，他滴溜溜顺将下来，仿佛失手一颠，却把众人吓着了，齐说不好，再一看时，他却从夹杆石上跳将下来”。这无与伦比的技艺，真叫人目瞪口呆。至于白玉堂，更是不把一切困难看在眼里。防卫森严的开封府，他敢于左冲右突；神圣不可侵犯的御楼禁苑，他敢于高来高去，甚至还在宫廷内刺杀太监，题诗留字，显得狂放不羁，挥洒自如。当然，书中对侠客技艺和胆识的描写，有许多夸张成份，这

在一定程度上反映“市井细民”对理想中的英雄人物的向往。

在晚清文坛上，出现《三侠五义》这样的小说，不是偶然的。鲁迅指出：“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，脂粉之谈，而此遂以粗豪脱落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。”人们读厌了长期以来占据文坛的荒诞淫靡、粉饰太平的作品，希望一新耳目，一变颓风，《三侠五义》便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。更重要的是，在面临重大变革的前夜，社会心理也发生重大变化，有相当一部分群众，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救星身上。斯大林说过：“在数千百年当中，劳动群众数十百次企图摆脱压迫者，而成为自己生活底主宰。但他们每次都遭到失败，受辱丢脸，不得不实行退却，不得不忍气吞声，隐忍着耻辱与冤屈，愤火与忿怒，而翘首望着渺茫的太空，希望在那里找得救星。”^①受到屈辱的人们，当他们还感觉不到自己力量的时候，便希望能有人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，特别希望能有人为他们以牙还牙，痛快地惩处压迫者。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侠客形象，往往是弱者们翘首长空渴望救星时所产生的幻影。石玉崑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说唱《三侠五义》，正是适应了社会心理的需要。鲁迅说《三侠五义》“为市井细民写心”，这是合乎实际的论断。

尽管《三侠五义》中的侠客义士，有为民除害，锄强扶弱的正义行动，但是他们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，并且都有严重的封建思想。白玉堂出于维护礼教的目的，惩罚追求男子违反清规的尼姑，就是一例。至于忠君思想，则在每个侠义身上都相当突出。展昭在耀武楼上的爬杆表演，表现得奴性十足。智化智盗九龙冠，明明是“犯上”行为，却还要把那顶皇帝的帽

① 见斯大林1924年1月26日在第二次全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悼念列宁的演说。见《列宁文选》（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）第一卷第26页。

子奉若神明，毕恭毕敬地“请出”。侠义们的行动表明，他们反对的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个别人物，而不是封建统治政权；他们所打击的是那些违反封建王法的人，而不是封建王法本身；他们剔除那些有损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的蛆虫，为的是巩固封建政权。“惊动公卿夸绝调”，为什么《三侠五义》能为公卿大人们所接受？主要原因，盖在于此。

（五）

《三侠五义》的作者是说书艺人，所以书中鲜明地体现出说书艺术的特点：情节曲折，结构紧凑。整部书，大关目包着小关目，若干个小故事构成一个大情节，一环紧扣一环，眉目清楚，引人入胜。

鲁迅说：“《三侠五义》及其续书，绘声状物，甚有平话习气。”石玉崑能够做到绘声状物，是因为他注意人物性格的描写。象展昭的雍容大方，蒋平的刁钻细心，欧阳春的藏锋不露，智化的跳脱机智，艾虎的天真纯朴，赵虎、徐庆的憨直粗鲁，都写得活灵活现。

在《三侠五义》里，白玉堂是作者用力最多也写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。从夜走苗家集开始，到误陷铜网阵结束，作者以全书六分之一左右的篇幅，写了他的一生，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很有特色，值得仔细咀嚼。

石玉崑写白玉堂一出场，就显得器宇不凡，同时又使人难以捉摸。当他看到一位可邻的老者欠了苗秀三十五两银子，便慷慨解囊相助；人们正在赞叹他的大方豪爽，谁知到了晚上，他却潜入苗家集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银子偷了回来，还削去苗秀老婆的双耳。这一细节，生动地显现出白玉堂见义勇为而又

工于心计的性格特点。跟着，书中出现“五鼠闹东京”一大关目。作者告诉人们，白玉堂要到东京找展昭比武。当展昭连忙赶回东京对付时，作者倒把比武的事情搁在一边，先写书生颜查散和豪客金懋叔萍水相逢的一段奇遇。等到颜查散被诬入狱，金懋叔把他救了出来时，作者这才点明，金懋叔原来就是白玉堂。而当白玉堂和人们打了一个照面，忽又飘然不见。这时，作者转过手来写包公衙门出现了刺客，有人胆敢在府中留刀寄柬；就在开封府忙乱不堪之际，有人竟又在皇宫里到处闹事。谁都明白，这是白玉堂故布疑阵，逢场作戏，但作者始终让他隐在背后。这种写法，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悬念，深感白玉堂性格的诡秘。紧接着，白玉堂盗了包公的官印，回到陷空岛，展昭跟踪前往，人们以为此番两雄相遇，必有恶斗。谁知白玉堂又避而不见；展昭直入内间，迎接他的却是穿着白玉堂衣氅的灯草人……。直至展昭中计被擒，白玉堂才露出了庐山面目。总之，作者写有关白玉堂闹东京的故事，一直延展了二十多回，情节曲折，引人入胜。其中，对白玉堂的正面描绘，却着墨不多，而又能使人感到白玉堂无处不在。在这里，作品情节安排得扑朔迷离，腾挪变化，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恰切地体现出白玉堂好胜诡谲的形象。人们没有看到他，却能感受到他那英风飒爽，豪迈不羁，可又年少气盛，目中无人的性格特点。我们认为，作者艺术技巧的高明之处，就在于能够启发读者的想象力，让读者从一鳞半爪的观察中，对人物形象获得比较完整的印象。

为了刻画人物的性格，作者采取形象对比的手法，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。展昭和白玉堂对比，一个宽宏，一个促狭；卢方和蒋平对比，一个忠厚，一个机智。白玉堂奉命缉拿欧阳春一节，对比尤为鲜明：一个是官差，盛气凌人；一个是钦

犯，容忍退让。刚一交手，白玉堂便败下阵来，感到无颜见人，三次要上吊自杀，结果都为对手欧阳春所解救。最后，还是欧阳春教给白玉堂双方都能顾全面子两全其美的办法。这样的比衬，使人物的性格显得更加鲜明。

《三侠五义》有离奇的情节，但也并非单以情节取胜，人物刻画的成功，是它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此外，语言通俗，结构完整，就不一一论列了。

以上，是对《三侠五义》及其作者的一个简略的评介，挂一漏万，或者言不中肯，在所难免，仅供读者参考。

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九日于中山大学

《忠烈侠义传》序

是书本名《龙图公案》，又曰《包公案》。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，从此书内又续成六十多本。虽是传奇志异，难免怪力乱神。兹将书翻旧出新，添长补短，删去邪说之事，改出正大之文，极赞忠烈之臣，侠义之事。且其中烈父烈女，义仆义鬟，以及吏役、平民、僧俗人等，好侠尚义者，不可枚举，故取名曰“忠、烈、侠、义”四字，集成一百二十回。虽系涵义之词，理浅文粗，然叙事叙人，皆能刻画尽致；接缝斗榫，亦俱巧妙无痕。能以日用寻常之言，发挥惊天动地之事，所有三侠、五义，诸多豪杰之所行，诚是惊心动魄，有人不敢为而为，人不能作而作，才称得起“侠、义”二字。至于善恶邪正，各有分别，真是善人必获福报，恶人总有祸临，邪者定遭凶殃，正者终逢吉庇。昭彰不爽，报应分明，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，无废书长叹之时。无论此事有无，但能情理兼尽，使人可以悦目赏心，便是绝妙好辞。

此书一部中，包公本是个纲领，起首应从包公说起，为何要先叙仁宗呢？其中有个缘故。只因包公事繁，仁宗事简，开口若说包公降生，如何坎坷，怎么受害，将来仁宗的事补出来时，反觉赘笔。莫若先君后臣，将仁宗事叙明，然后再言包公降生，一气文字贯通，方不紊乱；就是后文草桥遇后时，也觉省笔，读者亦一目了然。

惟是书篇页过多，抄录匪易，是以籍聚珍板而攢成之，以供同好。第句中有操土音，故书讹字，读者宜自明之。是为序。

光绪己卯孟夏问竹主人识